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秋季号

Autumn, 2011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9-08758-1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②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101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唐 敏 罗 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4851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7.5 字数 246 千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758-1/H · 1841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曲卫国

本期执行主编:曲卫国

本期栏目负责:

文 学:张 冲

语言学:曲卫国

翻 译:何刚强

本期编辑:

唐 敏 罗 兰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陈 靓

何刚强 姜 宏

姜银国 李 征

陆谷孙 曲卫国

沈 黎 沈 园

谈 峥 唐 敏

汪洪章 王建开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漂泊的心灵——论阿诺德·贝内特《五镇的安娜》中安娜的

边缘性特征 胡 强 杨争艳(3)

从海岛看世界——乔治·麦凯·布朗小说中的家园政治 王卫新(10)

走向“荒野”而非“荒芜”:论《丁登寺》的生态意识 王 宪(15)

再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性——从两位华美男性文学

评论家的性别批评实践说起 李丽华(20)

《幽暗之地》:个人型叙事声音解析 王莎烈(26)

男性主体意识的镜像误区——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

昆丁的自杀行为分析 王秀梅(31)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悖论 杜明甫(36)

《吉姆爷》的地理空间呈现 杜明业(41)

《橘子不是唯一水果》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艺术 高 群(46)

被科学测错的世界——对丹尼尔·克尔曼《测量世界》回归神性

秩序的探讨 姚 磊(51)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功能词汇计算研究综述 孙爱珍 叶向平(59)

“后方法时代”的外语教学——兼评《语言课程设计》

..... 王 峰 刘雪芹(66)

跨文化语境下的篇章与图像:中德讣告对比 陈 琦(72)

语用文体学研究前沿展望——第十二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语

用学与文体学界面研究”专题评介 毛延生(78)

翻译研究

《红楼梦》英译研究之中文版本 陈毅平(87)

论英语习语的翻译策略 谭卫国(94)

从“自然母”开始——鲁迅童话翻译的生态批评解读 郑意长(100)

中国画论关照下的王维山水诗英译 陈 曦(104)

林纾讹译何为 范 文(110)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漂泊的心灵

——论阿诺德·贝内特《五镇的安娜》中安娜的边缘性特征^①

胡 强 杨争艳

摘 要:阿诺德·贝内特是英国爱德华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五镇的安娜》是贝内特第一部以家乡陶瓷之都为背景、反映爱德华初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五镇小说”。参照社会心理学“边缘人”这一概念,分析小说主人公安娜在“空间”、“道德”与“身份”三层维度上的边缘性特征,不仅可以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变迁,还可以从侧面折射出贝内特对社会发展和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深切关注。

Abstract: Enoch Arnold Bennett (1867-1931)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glish novelists in the Edwardian era. *Anna of the Five Towns* is Arnold Bennett's first "Five Towns novel" which show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middle-class life in the Edwardian er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Anna's margin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space", "morality" and "identity".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British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also expresses Bennett's deep concerns abou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issues.

关键词:阿诺德·贝内特;《五镇的安娜》;边缘人

Key Words: Arnold Bennett; *Anna of the Five Towns*; marginal man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是英国爱德华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凭借其五镇系列小说在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的写作始于1896年,是贝内特第一部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的“五镇小说”。与贝氏同时代的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称赞它是“一幅美丽的”、能给人带来“意外”的“陶镇风景图”(Bennett and Wells, 1960: 85)。

小说中故事的发展跨越了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两个时期,在贝氏长达6年的写作与精心修改之下,小说于1904年终于成书,创作过程之艰辛似乎也预示着小说人物多舛的命运。主人公安娜是个善良、单纯和忠诚的陶镇女子。她年幼丧母,其父却爱财如命,吝啬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安娜在21岁生日那天继承了亡母的巨额财产,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安娜常遵父命去普赖斯父子经营的陶器厂催债,以致承受巨大压力的普赖斯最终因破产而

自杀。普赖斯的儿子威利在其父丑行败露之后准备逃往澳大利亚,直至与安娜告别之际才发现彼此深爱着对方,只是这段感情长久以来已被两家的债务关系所遮蔽。威利孤苦无望之际投井自杀,安娜则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作为她生命的归宿。

在这场爱情的悲剧之中,主人公安娜的边缘人形象贯穿于小说始终。“边缘人”是一个内涵较为广泛的社会学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看来,“边缘人”指的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库尔特·勒温, 2003: 181)。而另一位社会学家帕克(R. E. Park)则认为:“‘边缘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的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之中,并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意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又不被他们所不融于的新社会完全接受。他们站在两种文化或是两种社会的边缘,而这两种文化也从未完全互相渗透或紧密交融。”(Park,

^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社会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责任——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小说伦理主题研究(07CWW009)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爱德华时代文学知识分子研究”(11A123)成果。

1928: 881)从以上两位社会学家对“边缘人”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边缘人”这个概念是一种与“社会变迁”^①关联紧密的新兴文化现象。

身处社会转型期的贝内特对当时人们的心理特征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一兴趣在这部作品中多有体现。与贝内特的其他小说相比,国内学界对《五镇的安娜》的关注不多,已有的成果也大多聚焦于作品的自然主义创作技巧和人物的悲观情绪的解读,而对人物心理特征的形成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联挖掘不够。与贝氏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经尖锐地指出,贝内特“关心的是躯体而不是心灵”,他笔下多是些“外部特征单调无聊”的人物(伍尔夫,2000: 4)。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全如伍尔夫所言,在《五镇的安娜》一书中,贝内特就对小说主人公安娜的心理发展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写。在这种心理描写的背后,贝内特实际上是把对自己对社会变迁的一些理解与看法融入了人物曲折多变的命运。英国著名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道格拉斯·休伊特(Douglas Hewitt)曾言,“文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方法”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形式及其历史语境之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Hewitt, 1988: vii)。休伊特认为,只有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境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结合,才能更加贴切地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那么,安娜边缘人特征的出现究竟与五镇的特殊地理位置有着怎样的关系?在面对父亲特尔莱特先生的压制以及威利的求助时,陷入道德困境的安娜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安娜在经历从家庭女孩到女商人的身份转变之时,又对自身的心理作出了何种调整?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边缘人的视角出发,结合贝内特的自身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试图从“空间”、“道德”与“身份”三个层面解读小说主人公安娜的边缘性特征。

一、“充满自由气息”的角落

小说情节的发展围绕五镇而展开,这座陶瓷之都 是贝内特根据故乡的几个工业小镇为原型而虚构出来的。贝内特在给好友威尔斯的信中曾说过:“我确

信这些工业地区在某些方面真可以称为‘壮观’,充满了隐秘的光辉,而且直到现在还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注意到了它。”(Bennett and Wells, 1960: 36)从贝氏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家乡的浓厚感情。正是这份感情,激发了贝内特创作五镇小说的欲望。

贝内特之所以选择五镇作为小说的背景应该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通读小说我们发现,五镇地处城市与乡村之间,被田野层层包围,兼具城乡两方面的特点。在地理上,它们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是城乡的边缘区。而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城乡边缘区”实际上指的就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过渡地带,它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那边缘区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在研究边缘区的学者看来,“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生活条件上,城市和乡村之间都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存在着发展的梯度差异,这一梯度差异最明显的是空间,也即地理边缘效应表现最突出的地方自然属于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乡边缘区。”(郝寿义、安虎森,2004: 427)从以上对边缘区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分析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城乡边缘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五镇上的陶瓷业也发展迅猛,开始进行批量生产,五镇的环境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小说开篇就有一段有关五镇环境的描写:“这里的房屋都由红褐色的砖砌成,一栋栋排列在街道两旁,形状丑陋,缺乏诗意。”(Bennett, 1936: 9)与繁华的大都市相比,这五座未曾被人注意的小城镇多了一份宁静,少了一份喧哗。与乡村相比,由于陶瓷制造业的兴旺发达,五镇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城镇里工厂作坊的烟囱林立,白天喷出一道道浓烟,染黑了四周的田野。夜晚,烟囱喷出的阵阵火花,映照着五镇中黑沉沉的建筑物。”(同上,20)从这段细腻风景描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贝氏笔下“五镇的天空总是呈现一片黑暗,这些工业城镇肮脏、闭塞,使人畏惧,令人窒息。让人从精神上感到压抑,使人产生一种无助感”(Cooper, 1912: 220-221)。

当下盛行的人文地理学对传统地理学的重要推

^① 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称。首先,社会变迁既包括社会的进步,又包括社会的退步;既包括社会的整合,又包括社会的解体。它具有多维性和多指向性的特点。其次,社会变迁一般是用来描述那些包括特定的人口、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要素在内的社会整体性单位和社会综合性现象的系统变化,而不是指某些单一性要素的变化。再次,社会变迁除了反映社会整体的变化过程以外,也重视研究社会微观领域的具体变化过程 and 变化规律。(吴增基、吴鹏森等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25—326.)

进之一就在于它把物质层面上的地理时空秩序与伦理、政治等文化概念进行了有机的跨学科联结。以此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读者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助感或多或少都与五镇的独特地理位置有着某种内在的情感关联。五镇位于交界地带,这种“独特的城乡之间的区位造就了城乡边缘区在空间发展上具有动态的、在结构上呈现出各种景观、要素以及功能从城市近域到乡村边缘的渐变特征”(郝寿义、安虎森,2004: 427)。这样的渐变特征使得五镇既不像被各种先进思潮直接冲刷着的繁华都市,也不像信息闭塞的遥远乡村。处在交界处的这些小镇总能嗅到从都市传来的一丝丝新潮气息,这些气息悄悄地影响着小镇的居民,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但是,镇上仍有相当部分的居民思想保守,他们对新观念持有反感的态度,坚守着上一辈留下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安娜的父亲便是其中一员。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之下,安娜仍旧按照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与镇上的同龄人相比,安娜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探究其原因,我们还从安娜的家庭生活环境来做进一步的考察。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之下,安娜9岁时已精于家务。她的社交范围十分狭小,打理事务、代父收租、参加祈祷、去学校读书等日常琐事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我们把五镇看作是安娜个人成长的大空间,那么书中无数次被描写的厨房则可以看作是安娜生活的小世界。母亲过世之后,安娜就挑起了照顾父亲和妹妹生活的重担,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厨房里。

让读者感到奇怪的是,较之宽敞的客厅,安娜更愿意在狭小的厨房里接待客人。厨房狭小零落,与敞亮的客厅以及隐蔽的卧室相比,厨房在功能和位置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选择?或许是因为父亲从不踏入厨房。只有在厨房,安娜才能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或许是客人对厨房干净整洁的赞扬能使安娜压抑的心灵得到暂时的舒缓,让她体会到一丝成功的喜悦。其实,安娜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之中,她对厨房这个狭小空间的依赖感也与日俱增。在她眼中,厨房不仅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更是一片属于她的思想净土。

在小说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安娜意识到自己对亨利产生好感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找个朋友诉说心事,而是“渴望马上回家,

回到她的厨房,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Bennett, 1936: 17)。可以说,小小的厨房是她精神的庇护所,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平复心情,才能反思过去和憧憬未来。安娜似乎从不关心周遭对她的议论,更不愿意与社会产生过多的交集,她情愿躲在这个狭小的家庭空间之中,将自己牢牢地封闭起来。或许正因为如此,她也常常被旁人看作是不合群的神秘“异类”(同上,24)。当五镇的居民正通过不断调试自我来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小镇的快速变革的时候,安娜却始终展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静默的力量,顽强固守着那片专属她的狭小天地。这片天地可以说具有双层的边缘内涵:在空间意义上,她是城市的边缘人;在心理精神层面中,她游离于传统主流生活世界之外。她清晰地看到五镇在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却无法适应这样的改变,既无法超越自我,也无法让自我融入社会,陷入了一种隔绝与封闭的心理状态。对她而言,厨房的确是个“充满自由气息的”(同上,111)角落,但是,它实质上更像是一把透明的锁,以无形的框架将她锁在有形的自我世界当中。

二、道义之战

贝内特的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跨时代特征。主人公安娜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成长于爱德华时期。这种时代上的跨越性使得她对道德风尚的变化有着不同一般的敏感。细观英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个年代,“当权的君主为了巩固统治,都会用其认可的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聂珍钊等,2007: 258)。维多利亚女王为了巩固统治及发展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伦理规范来约束人民。上层阶级所宣扬的“认真、严谨、谦恭、依从、自制、自律”等道德律令,经过教士们长时间的宣传,已深入到了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在五镇上,安娜一家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安娜的父亲严格按照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道德传统来约束女儿的言行。在他看来,“妇女是家庭的牺牲品”(Bennett, 1936: 184),她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中的男子。安娜和妹妹安格尼斯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父亲制定的家庭规约,不敢越雷池半步。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父亲的同意方能进行,甚至逛逛公园也被禁止。从安

娜和妹妹的言行举止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那些道德规范已不仅成为这对姐妹的行为标准,更在某种程度内化成为她们的精神指南。

安娜名下有家不景气的工厂,而真正掌控这家工厂的是她的父亲,她只是父亲的傀儡而已。这家工厂的厂主普赖斯总是拖欠租金,安娜的父亲经常逼迫女儿去追债。安娜在追债的同时也目睹了普赖斯父子的艰难生活,被迫去追债仿佛就变成了她心灵上的一种煎熬。简单但却无情的债务关系将破产的普赖斯父子逼入绝境,普莱斯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靠伪造支票和挪用教会公款去应付老吝啬鬼的催逼。而伪造支票和挪用公款在当时道德律令颇为严苛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名,普莱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最后只能在绝望中选择自杀以求得灵魂的解脱。

安娜的父亲无疑要对普赖斯的自杀负起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本人却对此毫无歉疚之意。他这种咄咄逼人的追债行为有其合理的法律依据,但在深层次上却折射着一种商业社会中“金钱至上”的伦理精神。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历史批评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看来,“现金交易”已经成为了当时英国社会人际交往信奉的准则,在此影响之下,“真理和崇高的事物都已经死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无厌的贪欲”(卡莱尔,1999:54)。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贪欲,像一道道绳索束缚着安娜的父亲,使他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他所关注的只有“利害得失”和“实惠功利”,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漠然待之。在他的眼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过是用金钱来计算的利益关系,所有属于人伦秩序中温馨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他甚至从未感觉到过家庭的温暖。在他心目当中,女儿也仅仅就是管理房子的工具。

这种浸透着冷酷商业精神的处世态度在安娜父亲特爾萊特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五镇的其他居民身上也可以找到痕迹。五镇的居民对特爾萊特这个吝啬刻薄的财主毫无责怪,反而对在生存斗争中战败的普赖斯投以鄙视的目光,甚至谴责他的自杀行为。在他们看来,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普赖斯用自杀结束人生不仅违背了教规,更是一种道德懦弱的表现,这样的死丝毫不值得同情。为什么以往民风淳朴的小镇居民会如此冷漠无情?这或许与盛行于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契合着工业化的“进步”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的“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已逐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生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谁都不能心慈手软。在这场残酷的斗争里,无论你采取何种手段,而成功只是唯一的目的。失败者得不到怜悯,只有胜利者才可能获得尊敬。整个五镇只有安娜为老人的自杀难过,为威利难过。作为普赖斯先生的债主,安娜认为,她和父亲都应该受到良心道义的谴责,若不是父亲的苦苦逼迫,普莱斯也不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她很反感父亲的所作所为,但也深感无奈,犹豫之中只能成为父亲的同谋。小镇的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犹如一张挣脱不开的巨网,将安娜束缚在旧习俗与新思潮的双重重压之下。她内心充满着矛盾与焦虑,在父亲的权威压制之下几乎无法呼吸。彷徨无助之际,甚至就连整夜的祷告和忏悔也无法给她带来心灵的慰藉,无法让她在宗教的麻醉中寻找灵魂的出口。

精神无所寄托的安娜整天郁郁寡欢,殊不知另一种新的危机正朝她汹涌袭来。普莱斯死后不久,儿子威利向安娜坦白了他与父亲的不端行为。他告诉安娜,以前支付给她的银行支票是伪造的。但安娜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回应,反而对他充满了一种同情,希望能帮助他走出困境。安娜明白,帮助普赖斯父子就是与父亲作对,她内心对父亲权威的恐惧与对普莱斯父子的同情相互纠结,让她焦虑不安。在经过“辗转一夜的思考”之后,犹豫不决的她终于鼓起勇气把那张伪造的支票从父亲的办公室“偷出来并将之烧毁”(Bennett, 1936: 219),她希望此举能挽救普赖斯父子的名声。安娜的父亲得知证据被毁之后,十分愤怒,怒吼着要安娜“拿着她的支票滚得越远越好”(同上,246)。父女之间的精神对抗借由一张债务票据的存留可谓到达了最高潮。

安娜父亲的怒气并没有随着安娜婚期的日益临近而有丝毫的减退。他更没有为女儿即将踏入新婚的殿堂而感到丝毫的高兴,反而冷酷而决绝地拒绝了女儿添置婚礼礼服的合理请求。如果在以前,安娜一定会屈服于父亲的权威,绝口不再提此事。但是这一次她决定不再懦弱,决心极力争取她应有的权利。她的改变源于周围环境对她潜移默化作用。在萨顿夫人一家的影响下,她开始怀疑传统的家庭权威,并学会了反击,以求在道德的对峙中挣扎求存。安娜的挣扎对老吝啬鬼来说就是一种对权威的示威。面对她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老吝啬鬼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他“跳下椅子谴责安娜,把支票全部扔到她面

前,发誓不再和她讲话,从此断绝父女关系”(同上,246)。

对于父亲如此强烈的反应,安娜没有丝毫的准备,她忧心忡忡地承受着父亲情绪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父亲开始无视安娜的存在,甚至将打理家务的重担转交给年幼的小女儿安格尼斯。面对父亲不断施加的精神压力和情感逼迫,安娜首先变得“失语”,不再发出任何反抗的声音,进而是妥协,静静地等待着与父亲的和解。

小说的最后,安娜来到码头送别即将远行的威利,在彼此“眼神交汇那一刹那”,安娜突然明白了他们原来是如此深爱着对方。只是安娜已经“以身相许”于亨利,“要改变这一切已为时已晚”(同上,255)。她所能做的仅是把一张100英镑的支票塞在威利的手中,从此把这份爱深埋在心底。纵使自己的内心是如何挣扎与痛苦,纵使对自由是如何地渴望,温顺善良的安娜也不愿撕毁与亨利的那一纸婚约,宁愿一辈子忍受着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生活,也不愿背负道德负罪的十字架,因为她自小就“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接受了这样一条深刻的真理:女人的一生或多或少就是逆来顺受”(同上,255)。

安娜先是屈从,继而反抗,最后又是在矛盾中选择骑墙。从这场一波三折的道义之战中我们不难看出,安娜既不属于以道德严苛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也不属于以怀疑主义乃至否定理性传统为主要特征的爱德华时代。不敢与过去决裂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她是一个活在社会边缘的陌生人,一个处在这两个时代交界处的边缘人。她在放弃威利的同时,也放弃了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当她再一次地屈从于父亲的权威,妥协于现实环境的压力,最终沦为家庭旧有伦理秩序的牺牲品的时候,她的精神堡垒也在这场道义之战中随之崩塌。

三、“身无分文”的富翁

在谈及英国传统社会生活之时,钱乘旦先生曾指出,传统英国人十分讲究等级观念,非常注意彼此的阶级等级之分。“在伦敦的公共场合,人们很少与旁人交谈,唯恐稍不注意,与地位过低的人交谈而降低自己的身份,这在欧洲大陆各国同样也是罕见的。正是这种对自由的向往与浓厚的等级观念共同构成了英国文化的传统”(钱乘旦、陈晓律,1991:364)。但是,当我们用此传统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却发现五

镇的人们却少以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看重的贵族头衔来区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眼里,财富的多少才是判断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唯一标准。这种人际伦理的微妙变化恰恰折射了社会变迁的某种微妙信息。

安娜在21岁生日那天,继承了母亲留下的巨额遗产。这笔意外之财也垒就了安娜在五镇的物质地位。财富究竟能对人产生多大的影响?批评家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曾经说过:“金钱是一种很简单而又很奇特的东西。它与欲爱同为人类快乐的两大源泉,同时也和死亡并列为使人感到焦虑的两大因素。”(加尔布雷斯,1994:177)的确,以加尔布雷斯对金钱的看法来反观这部作品,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安娜当时的复杂心态。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大笔财富,安娜一开始异常兴奋,不敢相信自己从无到有的梦幻现实。但是她在开心的同时,也感到非常不安。她担心所拥有的一切将在瞬间化作乌有。这种既喜又忧的矛盾心绪使她在莫名之中对金钱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抗拒心理。她拒绝了银行经理罗瓦特先生递交给她的支票,“尽管她是那么渴望拥有”(Bennett, 1936:45)。她甚至主动要求父亲代为管理这笔财产。在外人眼中,安娜是五镇最富有的待嫁闺女。而实际上,她除了领取每月固定的生活费之外依然“身无分文”(同上,97)。

尽管有种种的不如意,但安娜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变化是不容置疑的。最为明显的改变之一便是以萨顿夫人为领袖的社交名流圈向她敞开了大门。萨顿夫人热情地邀请安娜参加她在家中举办的聚会。这样的社交活动对以前的安娜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那时的她心无旁念,能把父亲和妹妹的起居生活照顾好已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现在的她,则不仅要打理家务,更要忙碌于财产投资以及各种社交活动。借着巨额财产的声名,安娜从封闭的厨房慢慢走向了喧哗的社交场所,由从前默默无闻的闺女变成了五镇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人物。她频繁出现在五镇社交名媛的聚会上,言行举止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多优秀的男士也开始围绕在她的周围。这些外在因素的改变就如洪水袭来,让她手足无措,甚至感到忧心忡忡。对她这样一个“新人”而言,社会地位的改变不仅意味着个人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被动变化,更意味着一种无法适应改变后的焦虑和失落。这种焦虑和失落与安娜性格中的拘谨与自卑汇流在一起,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备受煎熬。安娜既

不懂艺术又不懂社交。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萨顿夫人聚会,她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怪物。作为五镇最富有的姑娘,她甚至连一件得体入时的衣裳都没有,与周围的其他名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为自己不合时宜的衣着打扮感到羞愧。而更为讽刺的是,这位“身无分文”的富翁看见时下最流行的巧克力竟然也会发出“我从未见过”的感叹(同上,97)。安娜是多么想融入名媛们的世界,却发现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备感受挫的她匆忙逃离了萨顿夫人家,重新缩回到那个狭窄无趣的小天地。

金钱不仅改变了安娜在五镇的社会地位,而且也让安娜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与五镇上的“杰出”青年商人亨利有着直接的关系。亨利在得知安娜继承遗产之后,在非常“恰当”的时间走进了她的生活。为了接近安娜,更为了扩大他自己的产业,亨利开始热衷于和安娜的父亲洽谈有关投资合作的事宜。亨利在利益分成方面作了最大的让步,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服他同意让安娜做合作工厂的合伙人。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之下,安娜的父亲同意了这笔生意,亨利的目的也最终得以实现。安娜一夜之间从一个家庭女孩变成了五镇上的第一个女商人。这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她做梦也没想过能有自己的事业,更没想到能和有着“完美男人”之称的亨利合作。但是,她也依然有她排遣不去的隐忧。虽然乐见这种商业上的合作,乐意尝试新的角色,但是她却不愿直面普赖斯父子,更厌倦去逼债。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安娜重新又变得沉默寡言,如对五镇狭隘平庸的生活气氛日渐感到窒息,她渴望摆脱父亲专横、粗暴的压制,渴望摆脱冷冰冰的商业合同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

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安娜其实自己也无法回答。能过上像萨顿夫人那样既开心又舒适的日子是她最大的奢望。一方面她非常羡慕碧翠丝能拥有得体的礼服以及所展现的优雅谈吐;另一方面她也非常钦佩碧翠丝敢于表达自我的勇气。尽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无限的遐想,但是在她的心底,仍然对自身身份的如此变化有着一定的犹豫与抗拒。她努力挣扎着,试图在过去与现在的纠结与冲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新的身份让她迷失了自我,内心也始终被一种茫然的情绪所困。她既摆脱不了旧角色的约束,又无力演好新角色,她在这两种状态中徘徊,陷入了身份焦虑之中。在读者眼中,她仅是一个游走在社会边缘地带的“身无分文”的富翁。

四、结语

贝内特通过对五镇日常生活的逼真描绘,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幅20世纪初期英国工业城镇中产阶级生活的生动画面。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更为迅猛。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对人们的生活环境、精神生活甚至阶级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是贝内特的小说中出现了边缘性的人物形象,劳伦斯、福斯特等同时代作家的小说也涉及了这一社会性主题。可以说,这一时期边缘性人物群像出现并非偶然。作家们异常敏锐,对于社会变迁中小人物的人生际遇感同身受,他们把这份理解融入了小说的创作中,使作品中的人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边缘性的社会文化内涵。

通观《五镇的安娜》,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这种边缘性特征集中表现在安娜身上。从物质空间上来说,出生在城乡边缘区的安娜,被父亲的权威禁锢于狭小的家庭空间之中。空间上的边缘性对安娜成长的影响非比寻常。她将自己封闭在专属的小世界里,试图获得心理的平衡。殊不知,她在拒绝接受周围环境改变的同时,也封闭了自己的心灵。从精神与道德层面而言,成长于社会转型期的安娜,既有维多利亚时代传统道德的深深烙印,又经历了爱德华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冲刷。这种道德上的边缘性让她在恪守传统道德与向往自由的两种状态中游走,在对忠诚与背叛等道德伦理问题的矛盾追问中艰难成长。最后,结合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看,安娜面对自己身份的转变,迫不得已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但是自身个性上的软弱却使她在努力适应转变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她游荡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思想始终为矛盾与冲突所困扰,陷入了两难境地,成为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缘人。她的叛逆与顺从,她的坚持与绝望,她人格中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等各种心理特征,都在贝内特的笔下一览无遗。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安娜的心理变化历程,也捕捉到了贝氏对转型期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一些批判和反思。贝氏也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深切地感受到了转型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思想范式上的“认识论的危机”(J. T. Boulton, 1960: 6)。在这部小说中,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人物对待财富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背后所显现的深刻社会心理动因

之上。批评家罗德·霍尔顿(Rod W. Horton)在分析现代欧洲文学的时代背景时曾经说过:“人们对财富的争夺,社会价值观中赤裸裸的实利主义以及工业化城市的丑陋现象,给这一时期的生活蒙上了肮脏和玩世不恭的阴影,并使那些对道德标准敏感的人感到悲观与绝望”(霍尔顿,1992:41)。罗德·霍尔顿所言可以说切中了小说社会性主题的实质,也从另一层面揭示了安娜悲剧形成的物质与精神动因。安娜是个敏感的人,这种敏感不仅体现在她对空间与道德边缘性的深刻体会,更体现在她对自我身份边缘性的反思之中。这种敏感无疑还具有文化社会学的意义和内涵,更是转型时期人们内心情感结构的一种时代特征。贝氏正是借着安娜这个对道德标准敏感的小人物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最终选择了以安娜开始其不幸的“新生活”作为故事的结局,这个结果似乎也预示着,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和进步,行走在“边缘”的人若无法对时代变迁做出自己积极的回应和改变,他们漂泊的心灵始终不可能找到人生归航的方向。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 [1] Bennett, Arnold. *Anna of the Five Tow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36.
- [2] Bennett, Arnold, and H. G. Wells. *Arnold Bennett and H. G. Wells: A Record of a Personal and a Literary Friendship*.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0.
- [3] Bellamy, William. *The Novels of Wells, Bennett and Galsworthy: 1890-1910*.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 [4] Boulton, J. T. e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London: The Shenval Press, 1960.
- [5] Cooper, Frederic Taber. *Some English Story Tellers: A Book of the Younger Novelists*.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12.
- [6] Hewitt, Douglas. *English Fic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890-1940*.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td., 1988.
- [7] 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8. 6 (1928): 881.
- [8] 郝寿义、安虎森编.《区域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 [9] 罗德·霍顿、文森特·霍珀著.房炜、孟昭庆译.《欧洲文学背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10] J·K·加尔布雷雷斯著.杜念中译.《不确定的年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
- [11] 卡莱尔著.宁小银译.《文明的忧思》.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 [12] 库尔特·勒温著.高觉敷译.《拓扑心理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3] 聂珍钊、杜娟、唐红梅、朱卫红.《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4]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15]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16] 吴增基、吴鹏森等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从海岛看世界

——乔治·麦凯·布朗小说中的家园政治^①

王卫新

摘要:除了短暂的求学岁月,乔治·麦凯·布朗一生与奥克尼岛相伴,海岛的意象及历史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丰富源泉。由于布朗的小说题材仅限于奥克尼岛的生活、历史和传说,他的作品常常被贴上狭隘主义的标签。其实,布朗的小说并不狭隘。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比奥克尼岛更中心,在奥克尼岛上他可以全面地观察生活,在历史的海洋中穿越,在传说和幻梦中成长。奥克尼岛展现了布朗小说的家园政治,它建构了作家“心灵的风景”,把私人的家园升华为和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文化空间。

Abstract: Except a few years for schooling, George Mackay Brown has been staying in Orkney for his lifetime. Orcadian images and history provide him with bountiful inspiration for creative writing. He is often labeled as parochial for his confinement to Orcadian life, history and legends. However, that is not the case. For Brown, no place is more central than Orkney, in which he can see life in the round. He crosses over the ocean of history and grows up in legends and fantasies. Orkney presents the politics of home in Brown's fiction, which constructs his mental landscape and elevates his personal home to nationality-related cultural space.

关键词: 布朗; 家园政治; 奥克尼岛; 苏格兰

Key Words: Brown; politics of home; Orkney; Scotland

乔治·麦凯·布朗(1921—1996)是20世纪苏格兰最杰出、最富于原创的作家之一。他于1921年出生在苏格兰北端的奥克尼岛,1952年在他的同乡、苏格兰著名诗人埃德温·缪尔的举荐下开始发表诗歌,196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爱的日历》。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布朗的诗歌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相比之下,关于布朗小说的研究则显得有些冷清。截至目前,国外仅有三本小部头的英文专著问世^②,EBSCO网站检索到的学术论文也可谓寥若晨星。由于布朗的小说题材仅限于他的家乡奥克尼岛

的生活、历史和传说,他的作品常常被贴上狭隘主义(parochialism)的标签。著名的苏格兰文学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吉福德就曾经批评说,布朗作为一个大作家,他却“选择了居住在一个只能从一扇窗看一处风景的房间”(Schmid, 2003: 15)。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蔓延的今天,在普通人的眼里,布朗的小说视野确实不够宽广。除了短暂的学业时间,布朗一生与奥克尼岛相伴,奥克尼岛的意象以及历史成为他小说创作丰富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源泉。按照欧内斯特·马维克的说法,奥克尼和谢特兰

① 英美文学中名曰布朗的作家有很多,仅苏格兰小说史上就有两个乔治·布朗:一位是19世纪末莱因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乔治·道格拉斯·布朗(1869—1902);另一位则是本文所研究的当代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乔治·麦凯·布朗(1921—1996)。非常有趣的是,笔者有一次和《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编委、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墨菲(Patrick D. Murphy)共进午餐,席间谈及布朗,墨菲数次不由自主地说:“我指的是乔治·麦凯·布朗,不是乔治·道格拉斯·布朗,他受到缪尔的影响,是苏格兰诗人埃德温·缪尔,不是美国自然诗人约翰·缪尔。”由此可见,即便在欧美学界,上述的两个布朗和两个缪尔都很让人纠结。因此,本文在标题中特意使用了全名。

② 三部专著是指博尔德的《乔治·麦凯·布朗》(1978)、肖恩的《乔治·麦凯·布朗散文作品中的叙述身份》(1994)和贝克的《乔治·麦凯·布朗与群体哲学》(2009)。

是“联合王国之内两个最不为人所知的群岛”(Marwick, 2000: 13)。用毕生的精力去书写地处偏远、不为人知的海岛生活和传说,很容易陷入地方主义的泥沼,慢慢地与世隔绝。但布朗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对他而言,奥克尼岛是一个“秩序之地、记忆之地、视野之地”(Fergusson, 2006: 1),如果他生活在城市,他的文学创作就可能会枯竭。在布朗的心目中,奥克尼岛不是边缘,而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中心的地方。在奥克尼岛上他可以全面地观察生活,在历史的海洋中穿越,在传说和幻梦中成长。奥克尼岛展现了布朗小说的家园政治,它建构了作家的“心灵的风光”,把私人的家园升华为和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文化空间。

一

家园是英美文学中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是,家园政治理论的成形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书写家园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彭斯的“我的心在高原”、维多利亚诗人勃朗宁的“异国相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书写思乡题材的名篇。当然,彭斯和勃朗宁诗歌中的家园主要是指家乡或曰故乡,它和我们所说的家园政治有很大的区别。家园政治是指文学作品中家园意识的凝聚和升华,是一种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书写家园的文学策略。虽然拉什迪的非虚构作品《想象中的家园》已经论及了家园和身份等诸多问题,而且“想象中的家园”这一说法被文学批评家广泛接受,但是,拉什迪的书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家园政治理论。真正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家园政治的著作是美国加州大学学者乔治所著的《家园政治》(1996)。这部书从全球英语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从英国文学到英语文学的转型中家园观念的变化、家园政治的内涵及其与帝国、民族、空间等的内在关系。

和其他的批评家一样,乔治讨论家园政治的时候也引用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段诗歌:“家是这样的地方,当你必须去那儿的时候,它们必须欢迎你进门。”(Frost, 1951: 58)在这段引文中,家被视作私人空间,它是一个人心灵的寄托。当人想回家的时候,家必须要迎他进门。乔治认同家是私人空间的前提,但对弗罗斯特的“必须欢迎你进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引用哲学家大卫·索菲尔的话,对弗罗斯特的诗进行了修正。在索菲尔的眼里,家不是一个必须欢迎你进门的地方,而是一个想欢迎你进门的地方。家的标志性的东西是“回家的人受欢迎的迹象”(George, 1996: 21)。乔治的家园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从全

球英语的角度重新界定了20世纪英语小说以及文学批评中的家园。家园不是一个中性的场所,关于家园的想象和关于国家、民族的想象一样具有政治性,从家园到家园政治是一种社会化的历程,它所展现的是与阶级、群体、种族等密切相关的权力。家园政治涉及地理、心理以及物质层面,是一种“建立区别的途径”(同上,2)。家园政治视阈中的处所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地图上的地理空间,同样,家园政治中的“政治”一词也绝不能简化为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

简而言之,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家园政治是一种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书写家园、用文学文本建构群体记忆和文化家园的文学策略。在当代批评的语境中,家园政治是在全球英语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家庭、家乡和故国的关系以及家园在建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感、安全感和精神动力的作用的重要途径。家园政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在家园政治的视阈中,家园更多的是存在于意识层面,而非实体层面。乔治认为,家是想象的处所,“它更容易固定在心灵的风光,而不是实际的地理空间”(同上,11)。虚构是家园政治的本质特征,家园是需要一系列的文本来建构的,通过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某个民族或者国家层面的家园意识,才是家园政治研究的主旨。当然,这并不是说实体层面的家园无足轻重。一个由家人组成、占有一定空间、能够隔离他者的家园是必要的,但离开了心理层面的地理空间,并不是现代人想要追求的家。因此,所谓的殖民,不仅是掠夺土地,更重要的是颠覆被殖民地区的文化以及把家庭和部落连接在一起的精神象征。失去土地的人并不一定丧失了家园,只有失去了“心灵的风光”的人才会失去家园。

其次,在家园政治的视阈中,家园并不等同于私人空间,它更多地是指和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文化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家园成为现代人意识中的领土核心,它是人们建构民族记忆以及国家图景的重要纽带。在遭遇他者入侵的语境中,家园和民族、故国的联系自然而然地会十分紧密。当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人们对家园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的认识会有所变化。因此,在讨论家园政治的时候,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家园的群体性和社会性,但也不能把家园政治和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简单地对等起来。

再次,在家园政治的视阈中,家园在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排他性。既然家园是建立区别的处所,那么,家园的排他性就应当是不可剥离的属性之一。弗罗斯特的“修墙”中邻居所坚持的“以篱为界、邻里相安”的古训不无道理,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如果墙或者篱笆真的能够带来邻里相安的和

谐社会,那么,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模式就不应当受到过多的指责。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家园政治把特别有碍和谐的他者排斥在外,才能使得生活在家园中的人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实现从附属到归属的跨越。在全球英语的语境中,研究家园政治必须具有跨文化、跨国界的视角,但是,即便在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的语境中,家园也不可能是天下大同、无限包容的世界。家园政治还会有我们和他者的分界,只是这种分界会越来越人性化,我们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

乔治家园政治理论的文本参照具有一个共性的特点,那就是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英国。英属印度的英国女性作家传输的是帝国意识,她们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享有比英国国内更多的女性自由,她们帮助丈夫持家、教化土著居民的琐事,在特定的语境中被升格为对于国家的贡献。康拉德从波兰移居英国,他的写作代表着一种伟大的传统,他用移民的眼光书写了英国这个新的家园。第三世界的英语写作则是远距离地书写家园,它打破了家园呈现中私人 and 公共政治的界限。而旅行写作可谓是集大成者,它用一种更加多样的视角书写了家园。乔治所列举的文学作品以“走出去、走进来、远距离、近距离”等多重视角书写了英国,他的家园政治理论中最最缺少的,就是一种以久居英国的英国人,尤其是从地处偏远的乡村或者海岛来书写英国家园政治的视角,而布朗的奥克尼岛小说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从英国,或者更为具体地讲,从苏格兰最为偏远的海岛看英国、看世界的视角。

二

奥克尼岛虽然地处偏远,人迹罕至,但它却是融苏格兰风情和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传统于一处的神奇海岛。用著名的苏格兰诗人埃德温·缪尔的话说,它是一个“普通的和美妙的之间鲜有差异的地方;活生生的人的生活都可以变成传说”(Schmid, 2003: 23)。在布朗的小说中,奥克尼岛上的居民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而安静和祥和恰恰是家园政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如上文所言,家园更容易固定在心灵的风景,而非实际的地理空间。对于外界而言,布朗所着力描绘的奥克尼岛的斯特罗姆尼斯小镇只是一个弹丸之地,生活在这个只有数千人口,几乎与世隔绝的海岛小镇是一种悲哀,但是,在小镇居民的眼里,奥克尼岛是一个大千世界,生活在其中有无尽的快乐。对于岛民而言,柯克沃尔和斯特罗姆尼斯两个弹丸之地之间的班车,就像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火车一

样重要。奥克尼岛的美酒、渔船、礁石、古城堡和小块田地都是那样地令人神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一一种悠然自得的心境。就像《在时间的海洋边》(1994)中的歌谣所写的那样:“我是陆地上的一个人,/我是海里的海豹人,/当我离陆地和海洋都很远,/我家就是苏里的一片孤岩。”(Brown, 1995: 159)

从家园政治的角度看,《在时间的海洋边》应当是布朗小说创作的巅峰,因为它出神入化地展示了家园政治的三个主要特征,即虚构性、公共性和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小说采用了现实叙述和幻想叙述交叉进行的结构,在现实叙述中,主人公索芬是一个“最懒惰、最无用”的男孩,整日游手好闲,沉浸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以至于父亲担心几代之后自己的家族将会从海岛上消失。然而,在幻想叙述中,索芬不仅寻访了神秘的拜占庭,还和骑士一起参加了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号称苏格兰独立战争第一战的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在拜占庭,索芬受到国王的礼遇,过着奢华的生活,然而,他却“越来越渴望奥克尼的青山绿水”(同上,16)。小说满足了他重回奥克尼岛的愿望,让他继续在无聊的农活、无聊的历史课堂中昏昏欲睡。而一旦坠入梦乡,索芬的神奇冒险就会重新开始,他马上就由一个游手好闲的、无用的男孩变成奥克尼岛的勇士。

布朗小说的最大魅力是幻想叙述和现实叙述的奇妙融合。《在时间的海洋边》不仅模糊了历史和现在的界限,而且跨越了幻想和现实的鸿沟。作家是这样让索芬进入通向拜占庭的幻想的:索芬的父亲回家,给了跑来迎接他的三个女儿每人一块巧克力,然后问起索芬的行踪,因为索芬吃巧克力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大家对索芬的行踪进行猜测,认为他肯定又去哪家老叟的小茅屋中去听夜色朦胧的故事去了。然而,叙述者否定了大家的结论:“实际上,索芬这个时候正在一艘瑞典的轮船上,是塘鹅号,它停靠在波罗的海的港口。”(同上,4)叙述者故意将“实际上”这个短语放在句子的开头,仿佛他所陈述的故事才是事实,给人一种索芬真的到了瑞典船上的感觉。读过故事之后,人们立刻就能意识到,所谓的“实际上”其实是美丽的谎言。《在时间的海洋边》曾经入围1994年布克奖最后的短名单,但最终未能折桂。评委当中只有诗人汤姆·鲍林对这部小说赞誉有加,其他人都感到很失望。其中一位评委的问题是:什么是时间的海洋?人如何能在它的旁边?(Ferguson, 2006: 284)对于读惯了虚构作品的评委们来说,布朗小说中的幻想也许真的会带来审美疲劳,但是,对于初读布朗小说的人来说,那种亦真亦幻的境界真的是美不胜收。

布朗的小说用亦真亦幻的手法书写了奥克尼岛的神奇,勾画了奥克尼岛居民心灵的风光,展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家园画卷。《在时间的海洋边》的幻想叙述中,奥克尼岛的居民有时真的是与世隔绝。索芬和麦克塔维什爵士赶赴班诺克本战争前线,路上在牧民家饮酒,当听到他们要去为苏格兰独立而和英格兰军队浴血奋战时,牧民丝毫没有敬仰之情,因为他对外界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旁边的村子,只认识来这里收税的人。“苏格兰?英格兰?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地方。”(Brown, 1995:26)但是,在现实叙述中,奥克尼岛和苏格兰乃至英国的命运就开始紧密相连了。《在时间的海洋边》中的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回顾苏格兰历史上的英雄,村头巷尾被叙述者戏称为国会,因为大家在这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小酒店老板麦克塔维什(即幻想叙述中的麦克塔维什爵士)是坚定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而渔船修理工本·霍伊则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奥克尼岛上最具权威的领导者是牧师,而牧师极力宣扬的除了宗教教义,就是联合王国的威严。从历史上讲,新教是促成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2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实施了政务与宗教分离的制度,威尔士效法了欧洲,但苏格兰的教堂则依然在国家以及地区事务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奥克尼岛是一个兼具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传统的地方,但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奥克尼岛永远属于苏格兰,属于大不列颠。从这种意义上讲,布朗小说中的奥克尼岛是一个和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文化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小说的聚焦点不是个人或者个人化的家庭,也不是整个国家,而是连接国家和个人的最为重要的纽带,即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群体不是虚构的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有着诸多共同点的个人组成的实体。提摩西·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群体主要有4个方面的指涉:它所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并且,最后,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呈现个体自我的语境(Baker, 2009:5)。如上文所言,奥克尼岛的地理区划十分明显,它和整个苏格兰民族的政治目标一样,既有一种怀旧式的英雄梦想,又拒绝过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个群体所共享的是一种原生态的、悖论式的伦理,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群体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布朗的小说着力书写群体,但他很少把群体混在一起来写,他笔下的人物各个特色鲜明,奥克尼岛的群体为个人提供了呈现自我的语境。在面对他者之时,奥克尼岛的群体配合相当默契。在布

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林沃》中,格林沃的群体面临着黑星计划的威胁,形形色色的人物开始出场,贪杯的渔夫柯斯顿、虔诚的鱼篓手韦恩斯、令女性心动的舵手韦斯特雷,他们个性鲜明,但在面对黑星计划的时候却能同仇敌忾。《在时间的海洋边》更为精彩地展现了奥克尼岛群体的团结和默契,负责征兵的官员和牧师的演讲都无法打动奥克尼岛居民的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始戎马生涯。无奈之下,牧师只好废弃民主,亲自点将。而第二天,当征兵官员来履行义务时,却发现,身强力壮的男子都人间蒸发了。尚在家中的男子只有索芬,而索芬的母亲说他得了恶性疾病,将不久于人世。果然,征兵官员再来之时,索芬已经“不在人世”。征兵官员一走,奥克尼岛立时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死去的”索芬复活了,人间蒸发的壮丁们又回来了,牧师欢迎他们归来,因为他也是抵制征兵的共谋者。

布朗小说中的家园是有一定排他性的家园,借用弗罗斯特的诗句来说,他的家园政治原则是“以篱为界、邻里相安”。奥克尼岛是一个宁静而且纯净的家园,奥克尼岛的群体和睦共处,有着共同的伦理方式和政治目标,只有危及群体的生存方式的人侵者才被视为他者。《在时间的海洋边》中索芬的妻子也是外来人,她只吃新鲜的海产,不吃面包和乳酪等奥克尼岛居民常吃的食品,但她很快被索芬的家庭所接受,他们的孩子也即将成为奥克尼岛的诗人。《在时间的海洋边》中居民抵制征兵,《格林沃》中的居民抵制黑星计划,因为在岛民的心目中,征兵和黑星计划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西方学者指出,《格林沃》中的黑星计划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国北海石油开发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布朗书写的是与军事或者工业相关的黑星计划,不是石油开发,但“它们的后果是一样的”(Schmid, 2003:14)。

布朗小说中的家园政治的核心是群体哲学。他选择从苏格兰最为偏远的海岛看世界,是因为在他看来,从海岛看世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以看得完整的。布朗曾经说过,一个人想看见一切是不可能的,人的视角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对于作家而言,选择一个他想看的方式尤为重要。奥克尼岛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书写,所以,“没有必要走到更多的地方”(同上,29)。布朗的小说立足奥克尼岛,但他的确看到了整个世界。《在时间的海洋边》中的索芬游历了拜占庭、班诺克本,《格林沃》中的舵手韦斯特雷对“今天谁和谁迎面而过?”的回答是“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Brown, 2004:3),《马格内斯》和《文兰》追寻到了奥克尼岛远古的历史,《红衣时代》让普通人走进了伟大的东方可汗的宫殿。布朗在一首广